

不同经济制度下的阶层再生产状况及其微观机制-1949-2009

郝雨霏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系列的市场经济改革措施在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准的同时迅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经济不平等成为了社会中最重要问题之一。到了 90 年代末期,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程度。从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从 0.29 增长到 0.39,到 2015 年基尼系数已经涨到了至少 0.52。

虽然用基尼系数来描述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是最常用的方式,但是对于不平等的全面理解仅仅有基尼系数是不够的。例如,我国基尼系数早已跨过了警戒线,但事实是我们的社会仍然基本稳定并再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爆发大规模阶级冲突的可能性非常低。社会不平等的测量可以有很多角度,单一的测量仅是一场“盲人摸象”的盛宴而已。

由于我国阶层分析长期的缺失(冯仕政,2008; Lin & Wu,2009; 林宗弘,吴晓刚,2010),因此建立在父代与子代的阶层地位上的社会流动的分析也非常薄弱。社会流动分析是一个从机会不平等角度去理解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最主要方式。分析一个社会阶层再生产,也就是代际间社会流动的状况,可以更加全面的理解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分配在一定价值体系下的不公平,如果从社会流动的均等机会的视角来看,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是被社会所认可的。有学者(边燕杰,社会分层流动那本书)就指出,社会不公平不全在于收入的不平等,不在于基尼系数有几个百分点,而在于个人有没有自由向上流动的管道,也就是说,社会流动程度高的社会更加公平,反之亦然。

要从社会流动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去理解过去 70 年社会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将这一过程放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这其中最根本改变就是市场化改革,也就是从再分配到市场机制的转变。在经济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伴随着两大制度的松动与瓦解,一为户口制度的逐步放开,二为单位制的衰落。户口制的松动直接关系到城乡差距的改变以及农民阶层与其它阶层流动渠道的恢复,单位制的衰落直接关系到城市中群体对资源获取分割性的瓦解。经济制度的变迁对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权利分配进行了重新界定。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大环境下,我们相信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分析并理解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下经济不平等产生的微观机制是什么,以及这个机制在经济政策变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全面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

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有:(1)通过代际间社会流动的研究,揭示中国社会在不同阶段的社会流动程度及其变化趋势,从经济机会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经济不平等;(2)通过分析家庭阶层背景、个人教育获得及个人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变化趋势来分析不同经济分配体制下经济不平等的微观机制及其变化;(3)通过对不同体制下经济不平等的微观因果机制的研究,为市场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对不平等的不同影响提出新的发现。

二、文献回顾及理论分析

1. 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状况

(1) 工业化发展与社会流动

从动态的角度看,任何社会的分层结构都存在着一个社会各阶层不断延续、复制、改变的过程,即阶层再生产。除非社会基本结构发生大规模动荡和解组,如社会革命,阶层的复制和延续是阶层再生产的基调。而社会流动,尤其是代际社会流动,是阶层再生产的主要机制,也是描述社会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的一句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表明了在传统社会代际间社会流动的相对贫乏,形象地描述的阶层再生产过程中的阶层固化。在工业化之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是以短流动为主,每一个社会阶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阶层内部再生产的。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个人的流动机会快速增长。

工业化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什么?工业化过程是否有助于社会的开发程度,即代际流动,尤其是长程代际流动的出现?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论预测:自由主义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Goldthorpe,2007)。自由主义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流动性会增强。地位获得模型(Blau&Duncan,1967)证明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逐渐降低而个人教育程度的作用逐渐家庭,这意味着先赋性因素影响降低而自致性因素影响加强,从而增强社会流动,形成一个开放社会。而戈德索普提出的理性行动理论认为个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是基于家庭的经济状况、教育期望、阶层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决策,即使经济发展到每个人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不意味着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会消失,这个差异会一直维持,进而维持职业地位获得的阶层差异,社会的流动性并不会增大,总体而言社会仍旧是再生产的,许多国家的实证数据都证明了这一观点。

(2) 中国社会的社会流动

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去理解过去 70 年社会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将这一过程放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的社会流动随着户籍制度及单位制的衰落与瓦解无疑在显著增强,加之近些年来的产业升级,社会的绝对流动率肯定是在上升的。但是,更能体现经济机会平等的相对流动率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我们不甚清楚。虽然在这个领域已有的研究不多,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其中也不乏争论。与国际的两种理论趋势相辅相成,一些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流动性会逐渐增强(Parish, 1981,1984; Blau&Ruan,1990; Deng & Terime,1997),另一派学者则认为相对流动性不变(Lin & Bian, 1991; 李路路, 2006)。但是这些研究都使用了仅仅城市调查数据,对于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社会来说其结论显得不够有力。

2. 不同经济时期的社会再生产机制

(1) 家庭阶层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教育一直被认为是个人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地位获得模型认为（Blau&Duncan,1967）在工业化社会中，教育作为自致性的因素，相对于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因素，在人们的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会逐渐增强。但是，在近几十年的教育社会学领域中，大量的跨时代、跨地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却指出了一个客观的现实：虽然在经济发达的社会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逐渐增加，但是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仍在持续（Goldthorpe,2007）。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学术问题：教育获得，是否可以视为单纯的自致性因素？换言之，教育的获得是否仅仅取决于个人努力或素质？如果是的话，教育机会的增加无疑会增加社会各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的机会，缩减阶层之间的差异。但是，如果教育机会的分布并不均等，教育的获得主要成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合法化方式，那么，即使教育机会总量有所增加，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也不会有质的改变。

涂尔干认为，教育在满足了不同职业地位对所需要的技能的培养的同时，还帮助人们内化社会价值观念，这其中就包括着职业阶层的形成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合法化程序之上的。与之对应的，是冲突理论的观点。冲突理论认为，优势阶层将其文化设定为标准文化，教育作为一种选择手段来帮助优势阶层垄断其优势阶层的地位。新马克思主义者更是认为教育是用来传递阶级价值的，它使社会阶层结构合法化，是产生阶层不平等的机构。

科尔曼早在 1966 年对美国学校进行研究之后就指出，对学生成绩影响最大因素是家庭社会经济状况（J.S.Coleman, et al,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1966）。尽管现代教育系统的选拔大多都通过统一考试为标准，似乎是以能力标准为主，但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证研究都发现，家庭背景对人们的受教育机会产生的影响一直在持续着，教育机会明显地向家庭出身背景较优越的人倾斜（Goldthorpe,2000;李春玲，等）。中国学者也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逐渐显现，教育提高了全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但是并未改变原有的分层结构（李春玲，2003；刘精明，2005；李路路，2006；郝雨霏等，2013）。

（2）家庭阶层背景对求职的影响

新经济制度学认为行动者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因此个人的经济行为会受到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的制约（embedness, Granovetter, 1985）。在求职研究中，很多分析都证明了利用个人的社会网络，采用亲属、朋友等非正式搜寻渠道容易获得成功（eg. Holzer, 1987; Blau&Robin, 1990; Gregg&Wadsworth, 1996; Granovetter, 1995）。而在中国社会中，强关系显然对个人有更显著的影响（Bian, 1997）。

边燕杰通过对中国的社会的研究发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认为家庭成员之间有义务相互帮助，尤其是在再分配制度下，通过强关系才能找到更好的关系人，从而获得较好的工作与更高收入。虽然在边燕杰近期的研究中也发现，

随着市场化改革，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弱关系”的作用也有所上升，但是根植于社会文化的“强关系”对职业获得的影响并没有显著减弱，仍然有着强大的解释力（边燕杰，张文宏，程诚，2012；郝雨霏，张顺，2016）。但是也有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化，市场规则一步步建立，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被压缩而人力资本的作用保持不变（张顺、程诚，2010；郝雨霏，张顺，2016）。因此，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社会资本对社会在生产的影响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之一。

（3）不同经济制度下家庭背景影响的变化趋势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本文的最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不同体制下社会流动状况的变化及社会再生产的微观机制的研究，为市场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对不平等的不同影响提出新的发现。在不同经济条件下，阶层再生产的微观机制也有所不同，通过文献的整理与分析，我们提出：

再分配时期（1956-1978 年）：大学的推荐制、工作顶替制度、户口制、单位制共同影响个人的职业获得，这些因素都和家庭阶层背景相关，因此家庭阶层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个人职业获得，但也不排除少部分精英获得成功，社会流动性弱，再生产程度高。

市场化时期（1978-1992 年）：高考制度的恢复，高等教育处在重建阶段，家庭阶层背景对个人教育的影响程度较低。于此同时，在改革初期市场规则不完善，投机行为较多，教育并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家庭背景对个人的职业获得影响下降。在这个社会阶段中社会流动性增强，但是更多的是产业升级的作用，相对流动性变化并不显著。

私有化时期（1992 年至今）：由于重点、私立学校的兴起，家庭阶层背景对个人教育的影响程度升高，教育成为一种再生产的合法途径，家庭背景对个人的职业获得影响回升。教育的扩大化使得人才供大于求，在竞争程度日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资本的作用提高，但是随着制度的建立，其作用由直接作用逐渐转变为间接作用。教育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途径，社会流动性降低。

三、分析策略与数据来源

1.数据来源

由于本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涉及不同的调查，因此由于分析的需要将使用多套不同的社会调查数据，包括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数据，“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调查”2009 年的数据（JSNET2009）。在分析不同经济时期的社会流动状况时，我们将使用合并后的 CGSS 数据，在分析其微观机制时我们将使用 JSNET2009 数据进行检验。

本文所使用的 CGSS 数据取自 2005 年、2006 年、2008 年与 2010 年的调查，在分析时将其合并为统一数据库进行分析，最终得到有效样本为 32674 个。其中。2005 年的有效样本量为 8641 个；2006 年的有效样本量为 8408 个，2008

年的有效样本量为 5447 个，2010 年的有效样本量为 10056 个。同时我们采取了加权处理。

“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SNET2009）”调查分别在长春、广州、济南、兰州、上海、天津、厦门和西安八城市进行抽样调查。每个城市作为单独总体，抽取约 1000 个样本进行入户调查（长春、济南与厦门为 700 左右）。先随机抽取足够的社区样本，然后每个社区抽 20 户，复查率为 10%，问卷回答率为 60%。最终获得了有效样本 7102 个。

2.变量测量

2.1 社会阶层的测量

本文将根据分析的需要，采取新韦伯主义作为理论依据，以权威、声望作为依据对中国社会进行阶层的划分，将中国社会划分为 6 个社会阶层，分别为：特权阶层、白领阶层、高级常规非体力与自雇阶层、监管人员与技术工人、低级常规非体力与半技术工人、农民；从阶层 1 到阶层 6，阶层地位依次下降。这个阶层分类的命名同时参考了李路路与戈德索普的分类方式，以戈德索普的划分方式为主，以李路路的阶层划分方式为辅，是一套有很强的理论渊源，同时又符合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划分方式。在第三章中笔者已经详细论述了选择此种分类的缘由及优势，在此不做赘述。

在合并了 CGSS2005、2006、2008 及 2010 的数据之后，我们总共得到了 32674 个样本，父代社会阶层与子代社会阶层都无样本丢失，但是在不同阶层的分布比例有很大差异。具体分布见下表。

表一 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布比例

	父代	子代	差异
高级服务阶层	5.07	5.12	0.05
低级服务阶层	7.82	9.41	1.59
高级常规非体力/自雇阶层	6.56	13.49	6.93
监管/技术工人阶层	8.12	12.20	4.08
低级常规非体力/半技术工人阶层	10.68	24.36	13.68
体力工人/农民阶层	61.75	35.41	-26.34
总计	32674	32674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父代与子代的职业结构有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差异是体力工人/农民阶层的减少，从父代中 61.75% 的被访者都属于最低阶层到子代中该比例下降到 35.41% 来看，我国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处于最底层的人口在逐渐向上流动。但是，向上流动的群体中，绝大部分流动到了中等阶层中，低级常规非体力/半技术工人阶层的比例增加了 13.68%，监管/技术工人阶层增加了 4.08%，高级常规非体力/自雇阶层增加了 6.93%，低级服务阶层仅增加了 1.59%，而高级服务阶层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从职业结构来看，我国社会仍然是金字塔结构，但是“塔底”的面积在逐渐缩小，有望转变为一个枣弧形社

会。

2.2 教育获得

大学学历：分为有大学学历和无大学学历两类。在全国综合调查的合并数据中，共有 32651 个被访者回答了教育获得这道题。其中获得了“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数为 4015，占总体的 12.3%。在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调查数据中，在教育

	1932-1977	1978-1992	1993-2009	获得这一
继承性社会资本	6.2%	13.6%	2.6%	题中共有
先赋性社会资本	9%	23.3%	30.7%	7079 个有
继承性+先赋性	13.6%	32.2%	32.2%	效样本。其

2174 个被访者获得了“大学及以上”学历，占总体的 30.7%，

2.3 社会资本

我们选用了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调查的数据对该组变量进行测量，由于本研究的理论需要，我们仅分析了来自家庭的先赋性社会资本。其中继承性社会资本指的是得到这份工作的途径是“顶替父母，顶替亲属，单位内招”三类样本；先赋性社会资本是指在找工作过程中“家人、亲属”给求职者提供过帮助的样本。比例如下表。

表二不同经济时期使用社会资本的比例

2.4 经济制度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共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阶段，若干个小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综合考虑的。提到经济阶段，我们通常将 1978 年以前划分为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时期，1978 年以后划分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后者又由于市场改革的侧重点不同划分为市场化时期（1978-1992）及私有化时期（1992 年至今）（《中国制度变迁》，林宗宏，吴晓刚，《社会》1010 年第 6 期）。

2.5 其它控制变量

同期群：通过被调查者出生年份计算而来，进而将被调查者按照年纪分为五组，分别为同期群 1（1937/1949）、同期群 2（1950/1965）、同期群 3（1966/1976）、同期群 4（1977/1985）。

性别：根据被调查者的性别编码而来，其中 1 代表男性，0 代表女性。

是否有配偶：根据被调查者的婚姻状况编码而来，1 代表已婚，0 代表未婚。

政治面貌：根据被调查者的政治面貌编码而来，1 代表中共党员，0 代表其

它。

户口：根据被调查者的户口性质编码而来，1 代表城镇户口，0 代表农村户口。

3.研究策略

3.1 社会流动分析

当代西方代际流动研究已进入第三代，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为其重要的代表人物（Erikson&Goldthorpe, 1992）。本文将采用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创立的 EGP 阶层划分框架，分析代际之间的绝对流动率及相对流动率的变化趋势，以及教育获得的绝对变化率及相对变化率。衡量代际职业分布差异的常用方法包括：差异性指数和净差异性指数。其中，差异性指数（Dissimilarity index）为使代际职业分布相同所需改变的职业分布比例，此数值能够描述代际职业分布的绝对差异性，直接含义其计算公式为：

$$DI(xy)=\frac{1}{2}\sum_{i=1}^n(|X_i - Y_i|)$$

净差异性指数能够描述子代的职业分布相对于父代职业分布向上偏移程度，此数值越大，说明子代相对父代的职业分布向上层阶层偏移。其计算公式为：

$$NDI(xy)=Pr(X>Y)-Pr(Y>X), \text{ 即:}$$

$$NDI(xy)=\sum_{i=2}^n X_i (\sum_{j=1}^{n-i-1} Y_j) - \sum_{i=2}^n Y_i (\sum_{j=1}^{n-i-1} X_j)$$

在上面两个公式中，X 代表父代的职业分布比例，Y 代表子代的职业分布比例， I_j 表示职业类别，n 表示职业类别数。通过对职业分布表的计算，得到以下分析结果。

对数可积模型是近年来社会流动分析领域的新兴方法，一般由三个模型构成：条件独立模型、稳定流动性模型与对数可积模型（Xie, 1992；Ericson&Goldthorpe,1992），通过与饱和模型的比较，从而选择最优拟合模型。对数可积模型通过比较其他层与参考层之间的平均优比，揭示社会流动机会的相对变化。若对数可积模型的估计参数显著大于 0，说明该层相对于参考层的相对流动率下降，社会流动机会更不平等；反之，说明社会流动性上升，社会流动机会更加平等；若参数不显著，则说明该层相对于参考层的相对流动性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相对流动率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模型 1：基线模型（条件独立模型）

$$\text{Log}F_{ijk} = \mu + \lambda_i^O + \lambda_j^D + \lambda_k^Y + \lambda_{ik}^{OY} + \lambda_{jk}^{DY}$$

条件独立模型的背后假定是父代的社会阶层与子代的社会阶层是独立的，不存在任何关联，这也就意味这社会阶层之间没有壁垒，各阶层的流动机会是平等的。

模型 2：固定流动模型

$$\text{LogF}_{ijk} = \mu + \lambda_i^O + \lambda_j^D + \lambda_k^Y + \lambda_{ik}^{OY} + \lambda_{jk}^{DY} + \lambda_{ij}^{OD}$$

稳定流动模型的背后假定是父代的社会阶层与子代的社会阶层是有相关关系的，并且关联度是稳定的，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模型 3：UNIDIFF 模型或对数可积模型

$$\text{LogF}_{ijk} = \mu + \lambda_i^O + \lambda_j^D + \lambda_k^Y + \lambda_{ik}^{OY} + \lambda_{jk}^{DY} + \lambda_{ij}^{OD} + \beta k X_{ij}$$

对数可积模型背后的假定是父代社会阶层与子代社会阶层的关联度不仅存在，而且还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阶层间的壁垒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加大或减小。

在上述公式中，O 表示父代阶层地位，D 表示子代阶层地位/子代教育获得，Y 表示同期群。在 UNIDIFF 模型中， X_{ij} 表示子代职业地位与父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获得的关联方式， βk 表示相对于参考群体，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获得与父代职业地位的关联强度与方向。

3.2 多元回归模型

根据因变量的性质及研究的目的，在分析个人地位获得的微观机制时本研究选择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说明不同时期社会再生产的微观机制对工资收入的影响。

模型为：

$$\ln(y_{ik}) = \beta_{0k} + \beta_{1k}x_{1ik} + \beta_{2k}x_{2ik} + \beta_{3k}x_{3ik} + \sum \beta_{jk}x_{jik} + \varepsilon_{ik} \quad (1)$$

x_{1ik} :教育获得； x_{2ik} : 家庭社会资本 x_{3ik} : 社会资本

四、数据分析与讨论

1、不同经济时期的代际流动状况

(1) 职业分布变化趋势

首先，我们来分析中国职业阶层结构的分布。表 6.1.1 与显示了中国子代与父代职业分布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同期群子代与父代职业地位分布的差异性。

表 基于同期群的子代-父代职业分布表

	全样本		1937-1949		1950-1965		1966-1976		1977-1985	
	父代	子代	父代	子代	父代	子代	父代	子代	父代	子代
高级服务阶层	4.0	4.1	2.5	5.6	3.8	3.2	4.5	4.0	4.9	5.2
低级服务阶层	7.0	8.3	3.4	9.1	6.7	6.7	8.4	8.2	8.7	11.6
高级常规非体力/自雇阶层	6.0	12.4	4.4	8.8	5.1	11.3	5.8	14.0	10.3	15.8

监管/技术工人阶层	6.6	11.0	5.2	10.8	6.8	9.5	6.7	11.3	7.1	14.4
低级常规非体力/ 半技术工人阶层	8.9	22.1	7.3	15.2	9.2	21.2	9.0	24.8	9.9	27.0
体力工人/农民阶层	67.6	42.2	77.3	50.5	68.3	48.1	65.6	37.6	59.0	26.1
差异性指数	25.4		26.1		21.1		28.5		33.2	
净差异指数	22.6		25.8		17.9		23.2		27.9	
样本量	32674		5655		12606		9517		4896	

从表一可以看到，父代与子代职业分布比例差异最大的为农民阶层，伴随着社会变迁，农民阶层在社会职业结构中的比例在逐渐降低。除了农民阶层外，其它阶层的比例均有所增长，其中高级服务阶层的比例较为稳定，远远小于工人阶层的增长率，说明随着社会的变迁及经济的发展，农民阶层的子女，更多进入到工人阶层与中间阶层，但进入服务阶层，特别是高级服务阶层的比例仍然有限。随着社会的变迁该阶层的比例也逐渐加大，并且子代的增速要大于父代，说明了子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

接下来我们从差异性指数来分析职业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全样本中子代与父代职业差异性指数为 25.4%，对比其它社会该数字较大，说明了中国近几十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非常快，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经历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密切相关。而净差异指数从最初的 25.8%，下降到了 17.9%，而后逐渐上升至 27.9%。这些都说明了，社会制度的变迁在向一个更好的方向进行，我国的职业结构在逐渐升级。

（2）绝对流动率及其变化趋势

绝对流动率是指子代相对于父代的职业阶层的变化情况，通过对绝对流动率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描述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情况。绝对流动率大致可分为三种：

（1）向上流动率，子代阶层高于父代阶层者为向上流动，向上流动者在总样本中所占比例为向上流动率；（2）向下流动率，子代阶层低于父代阶层者为向下流动，向下流动者在总样本中所占比例为向下流动率；（3）水平流动率，中间阶层（高级常规非体力阶层与自雇阶层、监管人员与技术工人阶层）之间的流动为水平性流动（Li & Devine, 2011），其在总样本中所占比例为水平流动率；三者之和为社会总流动率。我们在分别计算了全样本、不同同期群子样本的流动率之后，对前后样本的流动率差异进行了统计检验。

表 中国社会的绝对流动率及其变化趋势

	流动率	向上流动率	向下流动率	水平流动率
全样本(N=32674)	57.8	37.3	13.7	6.8
1937-1949(1)	52.9	39.5	8.5	4.9
1950-1965(2)	52.6	31.8	14.1	6.4
1966-1976(3)	61.4	39.4	14.5	7.5
1977-1985(4)	69.8	45.0	16.0	8.8
(2)-(1)	-0.3	-7.7***	5.6***	1.5**
(3)-(2)	8.8***	7.6*	0.4***	1.1***

(4)-(3)	8.4***	5.6***	1.5***	1.3***
---------	--------	--------	--------	--------

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总体的绝对流动率较低，为 57.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流动率 70%（Li & Devine，2011）。但是，中国社会绝对流动率随着社会的变迁显著上升，在第四个同期群样本中，绝对流动率达到了 69.8%，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 70%，这说明了我们的社会流动率在较为年轻的这一代人中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和有活力。但是在三类流动率中，向上流动率远远大于向下流动率以及水平流动率。若是在一个职业结构稳定的社会中，不难想象社会的向上流动率、和向下流动率应该保持平衡，但是我国的情况是向上流动率远大于其它两者，因此可以推测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绝对流动率增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再次说明了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与职业结构升级，使得中国有较高的向上流动率。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社会总流动率在稳定上升，但是向上流动率确在改革开放以前呈现下降趋势，社会总体而言向下流动率在增加而向上流动率在减少，这与特殊的历史时期密切相关。

(3) 相对流动率及其变化趋势

模型	G ²	df	p	rG ²	Δ	BIC
全样本（N=32674）						
(1) 条件独立模型	7089.8	100	0.00	--	19.2	6289.9
(2) 稳定流动模型	217.3	75	0.00	97.0	3.0	-561.4
(3) 对数可积模型	203.3	72	0.00	97.2	2.8	-545.1
(3) - (2)	14	3				

2、不用时期的微观机制分析

(1) 不同经济时期家庭阶层背景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

首先，我们分析父代社会阶层与个人高等教育获得的关系。我们以体力工人与农民阶层为参照项，可以明显的看到其它来自于其它阶层的人获得高等教育的几率更高，并且其差异也表现出了阶层性。表中所有的系数都通过了 0.00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1978 年至 1985 年出生的人中，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性差异最大，父代是高等服务阶层的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远远大于非技术工人及农民阶层，其系数为 0.453，而这个差异在 1949 年以前出生的人中系数为 0.173。一些阶层背景的系数在 1949-1956 或 1957-1977 这两个阶段相较有所下降，这并不难理解，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分不开的关系。但是到了市场化经济改革之后，高等教育的阶层差异显著拉大了。

表 不同时期父代社会阶层对子代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

变量名	高等教育 (1949 以前)	高等教育 (49-56)	高等教育 (57-77)	高等教育 (78-85)
高级服务阶层	0.173*** (0.020)	0.174*** (0.014)	0.277*** (0.010)	0.453*** (0.027)
低级服务阶层	0.168*** (0.017)	0.121*** (0.012)	0.230*** (0.008)	0.440*** (0.023)
高级常规非体力/自雇阶层	0.091*** (0.015)	0.109*** (0.013)	0.149*** (0.010)	0.328*** (0.022)
监管/技术工人阶层	0.100*** (0.014)	0.066*** (0.010)	0.091*** (0.009)	0.287*** (0.024)
低级常规非体力/半技术工人阶层	0.066*** (0.012)	0.045*** (0.009)	0.059*** (0.008)	0.239*** (0.021)
常数项	0.034*** (0.004)	0.019*** (0.003)	0.060*** (0.003)	0.144*** (0.009)
样本量	5,011	5,867	17,480	4,293
拟合度	0.045	0.051	0.075	0.150

(2) 不同经济时期家庭阶层背景对个人收入获得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用分样本的方式来分析不同经济时期个人地位获得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其变化。在这里,我们使用个人现工作第一个月的收入为标准来代表个人的地位。这个指标有很多问题,比如收入与地位并不是可替代的因素,但是若使用个人的阶层地位,模型会变得过于复杂,如果将阶层地位划分的更简单,如二分类或者三分类,又会造成大量信息的丢失。在我国最大的阶层差异在非技术工人与农民阶层和其它阶层之间,如果从其它阶层划分更简单的阶层分类其意义会大打折扣,但是若以仅区分非技术工人与农民阶层和其它阶层,会掩盖许多城市中的阶层差异。还有其它的一些常用的因变量在本研究中也并不适合,因此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最简单的收入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变量名	收入 计划经济时期	收入 市场化时期	收入 私有化时期
性别	0.022* (0.012)	0.100 (0.143)	0.255*** (0.041)
年龄	-0.016*** (0.003)	0.065 (0.043)	-0.008 (0.015)
年龄平方	0.001*** (0.000)	-0.001 (0.001)	0.000 (0.000)

政治面貌	0.018 (0.030)	-0.312 (0.232)	0.150** (0.068)
单位性质	-0.078** (0.038)	-0.581*** (0.190)	-0.319*** (0.043)
地区	-0.016 (0.012)	-0.451*** (0.171)	-0.234*** (0.045)
高等教育	0.115*** (0.018)	0.165 (0.170)	0.527*** (0.044)
先赋性社会资本	0.038* (0.020)	0.121 (0.166)	-0.055 (0.045)
社会资本	-0.004 (0.016)	-0.363** (0.156)	0.208*** (0.056)
常数项	1.378*** (0.053)	-0.729 (0.625)	-0.016 (0.236)
样本量	1087	268	2562
拟合度	0.103	0.11	0.114

从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最关心的人力资本变量与社会资本变量的影响有明显的规律,其结果与之前的理论预设基本一致。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有限,但是教育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是显著的。在市场化阶段,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变的不显著了,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初期,各种经济规则没有确立,投机者众多,原本应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因素对收入的影响也许会消失,在改革开放初期,“研究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也是我们用收入作为因变量必须面对的劣势之一。而在私有化时期,也就是市场经济改革较为完善的时期,教育的作用大幅提高,成为对收入影响最大的变量之一。

先赋性社会资本的作用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也相同:在计划经济时期,体制内的工作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收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因此其作用是显著的;在市场经济时期,顶替制、国家分配这种统分的制度被终止,源自于家庭的直接影响也随之消失。但是这并不代表家庭背景作用的消失,只是其作用机制从直接的继承性传递变成了在求职时使用家庭社会关系寻找更好的工作。并且随着家庭阶层背景对教育影响的增加以及教育对个人地位影响的增加,家庭阶层背景的直接作用机制转变成了通过教育这个中介因素间接作用的机制,这也和我们对不同时期个人地位获得的微观机制的预测相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经过理论与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市场的改革,我国社会的绝对流动率上升,社会变

得更加开放和有活力。但同时可以推测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绝对流动率增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说明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与职业结构升级，使得中国有较高的向上流动率。

其次，虽然社会绝对流动率上升了，但是相对流动率的变化却不显著。这说明了虽然社会经济制度改革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但是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阶层差异仍在通过一些方式有效维持着。

然后，作为个人社会地位获得最重要的因素----人力资本，其获得趋势随着市场的发展非但没有更加平等，反而阶层的差异性更加显著了。加之在市场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中，教育对个人地位获得影响显著增强，我们可以认为教育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起到了作为阶层在生产合法性微观机制的作用。

最后，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中无论在任何经济体制先都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但是其表现形式随着市场的改革有所变化。在计划经济中社会资本作用的主要途径为继承性，即“顶替制度”，在市场化阶段其作用的主要途径为先赋性，即“通过父母、亲戚介绍”，在私有化阶段其作用的主要途径为综合性，即通过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求职。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个尽可能开放、平等的社会。“开放社会”是指个人可以通过自致性因素的作用获得个人的社会地位，个人成就不受家庭、性别、种族等先赋因素的左右的社会。当今世界上令许多人向往的社会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开放社会”(Grusky)。虽然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社会，但是研究证明在美国个人的成就与家庭出身的联系并不高，代际流动率要高于其它发达国家，而在发达国家中最平等的瑞典，个人成就与家庭背景之间的联系也很低(Fischer, Hout, Jankowsku, etc. 人为的不平等，《社会分层》，格伦斯基主编，P55)。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令人向往的社会并不真正在于结果上的平等与否，而在于其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开放程度如何，向上流动的机会开放程度如何。通过本文的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得益于产业升级我们的社会正在像一个好的方面发展。但是，阶层间的再生产的状况仍然得到了有效地维持，离理想中的“开放社会”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